

人文与科学的结合者： 略论托马斯·A·西比奥克

余红兵

摘要：国际符号学界普遍将托马斯·西比奥克视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为重要的领军人物和符号理论家之一。本文认为，他的主要贡献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组织与领导了近半个世纪的国际符号学运动，汇聚不同领域的专家共同致力于当代符号学的研究，直接促成了符号学的全面兴盛，并造就和影响了一大批著名的国际符号学家；二是在不断推广“皮尔士—莫里斯”符号学传统的同时进行了高度的理论创新。尤其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秉承了人文与科学的学术渊源，将语言学、民俗研究、人类学、符号学与生物学相结合，提出了广义的跨越、融合人文与科学的动物符号学、生物符号学等研究范式，最终整合出三层级的符号建模系统理论。可以说，这是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符号学作为跨学科方法论的功能与构想，为后世开辟了广阔全新的符号学研究空间。

关键词：西比奥克；语言；符号学；建模系统；符号域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23)01-0071-09

引言

说起当代新兴的符号学，中国学界一般较为熟悉的自然是查尔斯·皮尔士 (Charles Peirce)、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翁贝托·艾柯 (Umberto Eco)、米哈伊尔·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 与尤里·洛特曼 (Yuri Lotman)，等等。原因是什么？稍微留心观察，我们就能发现其中一个颇能引人深思的共同点：无一例外，这些符号学家有着人文学

作者简介：余红兵，博士，加拿大 Toront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助理教授，大连外国语大学启航讲座教授、国际语言与文化符号学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师范大学国际符号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符号学、语言与心智哲学、文化与传播。

科背景。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皮尔士的研究面固然是异常广泛，包括了逻辑、地理、数学等方面，但是其符号学理论的一个根本落脚点依然是“人的认识”。此外，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虽也有涉及控制论与系统论等等，但并未超出将自然科学的模式借用到人文学科的描述层面，比如其“符号圈”概念(semiosphere, 也可译为“符号域”)，就是从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Vladimir I. Vernadsky) 的“生物圈”概念中得到的灵感，然后用于文化分析(康澄, 2006: 101)。中国的符号学界在做符号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的时候，囿于学科体制的划分，总体来说也是倾向于人文社科，比如语言学、文学、传媒学和社会学等等，极少真正关注自然科学，如生物、化学、物理、工程科学等等。其实，这个现象也很好理解，只要看看我们的符号学事业的起点和现状即可。赵毅衡先生早在其《中国符号学六十年》一文中就对此做过颇为详尽的梳理，同时将中国的符号学事业从无到有、到如今的兴盛、到未来的方向，都概括得颇为精当。从该文章纵观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史，说“人文性”是其较为明显的特征，大体上是没有问题的(赵毅衡, 2012)。

然而，从 20 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符号学以及其他学科不断地往纵深发展以及相互联系渗透，人们就愈见学科分立的弊端，突破学科界限、倡导相互借鉴的必要性和优势也愈加明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具有先见和勇气的符号学家做出了大胆的创新和尝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位领军人物，就是被誉为当代符号学集大成者与“助产士”(Anderson, 2011: 23) 的北美符号学家托马斯·A·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 1920 - 2001)。介绍这位重要的符号学家，讨论探索他的符号学思想，对中国当今的人文社科跨学科研究以及文化符号学的理论及应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西比奥克的学史地位

托马斯·西比奥克于 1920 年 9 月 9 日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1937 年随其父迁居美国，2001 年 11 月 21 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逝世。其卓越的一生，正好与符号学在 20 世纪的发展壮大紧密相连并相互重合。2000 年在美国的普渡大学，美洲符号学会举办了第 25 届年会，当时会议的主题就定为“西比奥克的世纪”，以此表彰他为 20 世纪的符号学事业所创下的丰功伟绩(Simpkins & Deely, 2001: xxix)。在他逝世之后，西比奥克被尊为“美洲符号学之主和总体符号学之父”(Simpkins & Deely, 2002: v)。

提起西比奥克，中国符号学界一般会联想到他的“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 也含有“全球”之义)等，或者视其为杰出的符号学活动组织者。然而，在国际符号学界，尤其是北美—欧洲符号学界，西比奥克的名字却几乎是 20 世纪后半叶世界符号学发展的主要标签。已故的美洲符号学会前会长及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前主编约翰·迪利(John Deely, 2011: 123) 曾经写道 “我在符号学领域有许多朋友，其中就

有杰出的翁贝托·艾柯。艾柯是流行文化圈中符号学的真正象征人物，但即便如此，符号学发展到 21 世纪头十年的这样一个历程中，在我们一贯看来，只有托马斯·西比奥克才能被称为 20 世纪唯一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这一点我们固然可以辩证地去看。客观地说，关于符号的研究是一个集体的事业，由古往今来的无数学者共同参与和促进，赋予某一个人百年之中唯一最重要的角色，难免会显得有偏激片面的嫌疑，这本身也是历史人物符号化的一个例子。然而，从其初衷出发，立足于全球符号学理论发展历程和现状来看，我们也难以否认迪利的说法确实有其一定的道理。

符号学的历史根源深同哲学，但是作为具有国际规模的知识运动，那还是 20 世纪(尤其是后半叶)才有的事情，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归功于西比奥克(Deely, 2011: 123)。20 世纪初，大西洋两岸的皮尔士、索绪尔以及中国的赵元任，在相差不多的时间里，各自独立提出了关于符号研究的构想。后来的符号学作为一种思潮发展起来，直到 20 世纪中叶，一直都主要围绕着人类语言，做不同程度和范围的展开，或深入发掘、或横向比拟，并多以索绪尔传统为重。在西比奥克到来之后，符号学领域得到极大拓展。西比奥克极为活跃，且研究视角宽宏独特，尤其注重跨学科联系。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他就不遗余力地全面展开和推进其称之为大传统(major tradition)的“皮尔士—莫里斯”一脉的符号学理论研究(Petrilli & Ponzio, 2001: 6)。他是国际符号学会(IASS-AIS)及其会刊 *Semiotica* (当代世界符号学的顶尖刊物)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并担任该会刊主编直至去世(1969-2001)；他也是美洲符号学会(SSA)及其会刊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的创立者之一，并担任过该学会主席及会刊主编；此外，西比奥克还担任过其他许多重要的职务(Umiker-Sebeok, 2003)。从进入符号学界开始，西比奥克就几乎从未停止过国际符号学活动的组织工作以及符号学出版物的编辑、撰写与推广发行，数量之巨大、影响之深广、效率之惊人，在符号学史上极为罕见(Cobley, 2011: 85)。他的不懈努力为符号学事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充足的条件，造就和影响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符号学家，其中就有他的生前好友翁贝托·艾柯。事实上，用艾柯自己的话说，两人的深厚友谊长达 30 多年，直到西比奥克离世，而且正是因为西比奥克的慷慨智识，艾柯的作品第一次得以用英语出版(Eco, 2011: 465)，其《符号学理论》也成为西比奥克主编的《符号学前沿》书系中的一部经典。可以确定地说，如果没有二者当年的紧密合作与全力推动，也就没有当代符号学(薛忆沔, 1996)。此外，西比奥克热心鼓励后学，为同行创造条件，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就是“有两个根本策略来实现(学术事业顺利发展的)这两个目标：一是尽可能多地出版与教学，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倾尽全力地帮助同行取得这些方面的成功。这些是我的学术生涯中唯独想做的两件事”(Sebeok, 1995: 125)。

因此，仅仅将他视为一个符号学运动的杰出组织者，未免过于偏狭，有失中肯。事实上，西比奥克是通过其独到的理论和实际的行动实现了符号学跨学科的

第一人。他成功地将符号论、语言学、人类学和生物学相结合，批判了西方符号学研究的“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和“语言中心论”(glottocentrism)，早期带领着北美符号学做了全新的拓展，将影响扩大到先是北欧如芬兰、丹麦等，继而是德法符号学界，再就是欧洲符号学重镇——塔尔图学派。在他倾力构建的国际符号学发展框架中，新世纪的符号学研究真正实现了其作为跨学科方法论的功能与构想，跨越了语言学、哲学、生物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众多不同学科，不再仅限于人文领域。这一点，可以从西比奥克逝世之后历届世界符号学大会的空前盛况得到验证。实事求是地说，当今之世，符号学研究已然遍布全球。当前国际符号学的格局——即使有中国的特殊“符号国情”的存在——已充分印证了西比奥克在世时的预言并实现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这不仅表示符号学跨越了全球国界，更表示符号学渗透了不同学科，囊括了从微观到宏观的全面的符号学视野，创生了如内生符号学(endosemiotics)、植物符号学(phytosemiotics)、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人类符号学(anthroposemiotics)、生物符号学(biosemtotics)、生理符号学(physiosemtotics)等等众多分支(Deely, 2011: 125)。而这一切，需要归功于全球符号学者的共同努力，更要归功于西比奥克的引领、促进与支持。

跨越人文与科学的理论渊源

根据西比奥克自己的叙述，对他影响最大的有这样几个人：哲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语文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理论与实验生物学家雅各布·冯·乌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及其孙舒尔·冯·乌克斯库尔(Thure von Uexküll)以及动物心理学家海尼·赫迪杰(Heini Hediger)(Cobley, *et al.*, 2011: 3)。概括起来，西比奥克符号学理论至少有着横跨人文与科学的四重渊源，分别是语言学、人类学、生物学和“皮尔士—莫里斯”符号学。

西比奥克最初的起点是语言学，这个重要事实在国内符号学界鲜有人知。他先后师从布龙菲尔德和雅各布森，受后者的影响尤为巨大。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西比奥克就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开始专门的语言学研究学习，当时布龙菲尔德正好在此校任教。西比奥克回忆中提到布龙菲尔德的班级非常小，是“迷你型”的，因此有非常充足的机会与之单独探讨语言学问题(Sebeok, 2011: 451)。鉴于母语是匈牙利语，西比奥克采纳了布龙菲尔德的建议，从事芬兰乌戈尔(语)族(Finno-Ugric)的研究，并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后来在二战期间还因此而担任美国战略情报部(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空军语言训练项目的主任。西比奥克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卓著，除了大量的论文之外，他还撰写和编辑了 40 多部颇有影响的语言著作(Umiker-Sebeok, 2003)，尤其是于 1963 年至 1976 年间他所主编的《当代语言学趋势》大书系 14 卷，名噪一时，西比奥克邀请了当时世界各地的著名语言学家参与书系编写，其中就有乔姆斯基与赵元任。

西比奥克逐渐转向符号学的研究，事实上归因于一些偶然事件。1940年春，时任芝加哥大学德语系与语言学系主任的布龙菲尔德因学术及教学工作量过大，需要文书助理，但他所提出的申请遭到当时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部主任理查德·麦基恩(Richard Mckeen)的无理拒绝。因此事，加上麦基恩本人对语言学的一贯鄙视，让年轻的西比奥克颇感不平。布龙菲尔德在种种限制之下，提出辞职，离开了芝加哥大学。事后在与麦基恩的一次会面中，西比奥克问及是否有人会代替布龙菲尔德教授语言学，引起麦基恩无端怒火，言语冲撞之后，西比奥克竟被开除出人文学科部。幸而有莫里斯帮助，西比奥克转向人类学完成在芝加哥大学的本科学业(Sebeok, 2011: 453-456)。

在转入人类学专业并顺利完成学业之后，西比奥克于1942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深造，顺其自然地研究起人类语言学。由于学校分派的导师显得很无能，西比奥克就请当时流亡于纽约的语言学家雅各布森作为自己的硕士导师，为此，他宁可选择不断地往返于普林斯顿和纽约之间，因为雅各布森当时正在纽约当地的一个学校任教。西比奥克于1943年顺利获得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印第安纳大学执教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1945年他又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东方语言与文明专业的博士学位。

看到这样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知识背景，人们自然会想到西比奥克的符号学理论应该更多倾向于索绪尔的传统，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西比奥克从事符号学的研究既非单纯的对莫里斯符号理论的继承与发扬，也未在研习的过程中受缚于专业的区分，而是一直将语言学、人类学、符号论和生物学紧密结合、触类旁通。雅各布森对西比奥克的语言学研究的确有关键的影响，但对其成长为符号学家的影响却并不如此。这里的关键因素是西比奥克在芝加哥期间所产生的对“生物学思路”的由衷喜好。尤其决定性的时段是1960-1961年间，西比奥克在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度过了其称之为“宝贵无价的自由时光”。另外，西比奥克对“皮尔士—莫里斯”符号学传统的尊崇远超过对索绪尔传统(他称其为小传统, minor tradition)的有限肯定，在他看来，将符号活动(semiosis)与语言符号模式相等同或类比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谬误”(pars pro toto fallacy)，他的这个看法已得到当代国际符号学界的认同。

需要补充的是，莫里斯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早期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了美国前所未有的符号学系列课程，的确也正是这个课程将西比奥克直接引向了符号学的研究。这名才华横溢、思路活跃的学生受到莫里斯理论的启发，与符号学结下了毕生的不解之缘，并继承与发扬了“皮尔士—莫里斯”的传统；然而并不仅限于此，西比奥克将多年来所研究和积累的广阔背景知识，不断地融合、创造与突破，并凭着令人叹服的勤奋、坚毅和社交组织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横向联系，全面地推进了当代符号学的发展，成功地展示了如何将“卓越的学者”和“英明的领袖”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身份轻松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开创性的交叉融合

西比奥克曾将学者粗略分为两类：一类是鼹鼠型(moles)，一类是蜜蜂型(bees)。在肯定前者不可或缺的作用的同时，他将自己看作是一只学术蜜蜂(academic Apis mellifera)，不停地飞逐于各种花丛，为之传播授粉，并采制优秀的花蜜(Sebeok, 1995: 121)。这在跟他持不同学术意见的符号学术圈也是众人皆知的事情，甚至还有人就用此来攻击他。但不管怎么说，西比奥克的这个自我比喻还是非常贴切地描述了他一生的符号学事业，简单概括起来，也就是两个词：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在西比奥克之前，符号学的通行范式是尊崇索绪尔传统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不少结构主义者后来也看出他们的理论中封闭、静态的一面，并开始转向后结构乃至是彻底解构的研究路线。然而，结构、后结构、解构都无法避免其理论内部先天的缺陷，要么是缺乏动态关照，要么是有限改良，要么是深陷自我解构的泥沼而自毁理论根基。而新世纪的符号学研究日渐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对图像学、行为学、生物学、化学、计算机等新型符号学研究对象的关注，语言符号模式已然无法满足需要，这种现状迫使当代的符号理论必须实现其跨学科方法论的功能和使命。西比奥克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做的尝试，在当时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突破学科限制的典范，在如今仍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现代生物符号学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西比奥克所开启的超越人类中心的视角，他的符号宇宙(semiotic universe)、符号建模系统(semiotic modeling system)等等为这门符号学分支奠定了理论基调(Barbieri, 2008: 1-3)。

西比奥克的符号宇宙概念并非是天马行空的独特创新，而是对皮尔士符号理论的忠实继承。皮尔士(Peirce, 1935: 448)曾说“宇宙即使不是全由符号构成，也是充斥着符号，无处不在”。西比奥克的符号宇宙，为符号存在的普遍性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它至少包含了以下方面的研究：现代生物学视域下生命的符号活动；人类语言与非语言的符号；人类有意与无意的符号活动；多元阐释与一元阐释的符号；指示符号、规约符号与类象符号的全视角关照；历史上的符号思想与人物的梳理。仅这些就远远超越了索绪尔传统下的符号学研究(Petrilli & Ponzio, 2001: 21-23)。

符号模型理论事实上有很多人提出过，比如扎利兹尼亚克(Zaliznyak)、伊万诺夫(Ivanov)、托波罗夫(Toporov)以及洛特曼(Sebeok, 2001: 139)，赵元任先生在 1960 年参加国际逻辑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大会的时候也提交过一篇关于 model 的论文，在当时未受重视，但却深受西比奥克的赞赏(Sebeok, 2001: 140-143)。在这篇论文中，赵元任梳理了自己 14 年里所研究过的不下于 30 多个语言学模型和一般模型，但其中无一个与苏俄符号学传统中的模型相对应，也证明了这个术语意义的广泛(Chao, 2006)，国内也有人将它翻译为“模式”和“模拟”。相比较而言，洛特曼的建模系统理论较为权威，堪称符号学经典概念。在他看

来,自然语言是构成了第一建模系统,文化系统是建立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上的第二建模系统。对此,西比奥克提出了不同看法,他结合进化论、语言史、认知理论和生物学尤其是乌克斯库尔的“圆境”(Umwelt)理论,对模型概念的本身做出新的阐释,批判了俄苏符号学中的二级建模系统,在不否认自然语言可以被看作建模系统的前提下,认为它并不构成第一系统,而是在语言和文化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基本的系统“非语言”符号系统。因为人类拥有语言的历史相对来说要比整个人类史简短得多,另外语言应是一种人类进化史上的“适应”(adaptation)与“联适应”(exaptation),其原初功能应是为了建模(modeling),而并非是交流,因为后者完全可以通过历史更为悠久的非语言方式进行,正如所有的动物一样(Sebeok,2001:139-149)。这也符合其一贯的反语言中心论的主张。事实上,洛特曼的二级建模系统在欧洲符号学界与中国符号学界得到广泛认同,但并没有像国内有些意见所说的“得到了符号学界普遍承认”,反而是西比奥克的广义符号模型论,即使是在如今的塔尔图,也获得了高度的认可(Kull,2011)。

未竟的事业

概括而言,一项学术事业的成功,起码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学术的本身,二是学人的联系。若只有学术,而无学人的联系,无异于闭门造车、脱离现实,或是曲高和寡、寄望后世;若只有学人的联系,而荒疏学术本身,则无立根之本,始终成不了气候。可贵的是,西比奥克本人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同时他也为其他人无私地提供了第二个条件(Cobley,2011:85)。他为国际符号学界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广义的动物符号学、生物符号学和总体符号学理论体系,宽广的国际符号学人际网络。另外,在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系符号学图书馆的托马斯·西比奥克纪念图书馆里面,收集了他生前所有生物学和生物符号学的个人藏书(Kull,2011:224)。然而,西比奥克的事业并未结束。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一直想成为一名纯粹的生物学家,虽然生物学思路在西比奥克的符号学思想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他终究还是壮志未酬(biologist manqué)。但也正是他的这个特殊的生物学视角,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以及信息科技突飞猛进的20世纪背景下,实现了西方符号学研究范式的突破。这也直接鼓励了不少西方符号学派进一步摆脱纯人文思路的束缚,其中就有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视角下的符号学研究。这就使得新世纪的符号学呈现出了与20世纪迥然不同、多姿多彩的局面。即便如此,来自符号学内部不同派系的学术观点差异甚至是冲突,加上学科长期分立所产生的术语和理论的障碍,符号学作为跨学科方法论的功能还有继续扩大和深入的空间。另外,关于非人类符号系统以及非语言符号系统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是“反人类中心”和“反语言中心”的,它们最可靠的学术立足点应该是什么,等等,这些也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发掘和探讨的符号学课题。

结 语

西比奥克对符号学的毕生贡献，可以说是继往开来，使符号学在世界范围内得以真正立足。他的理论，易于操作，且实用性强。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坚持人文传统视角的符号学界对其理论的接受程度如何。显然，数十年来，欧美符号学界尤其是生物符号学和系统论控制论符号学领域对西比奥克的认同有目共睹，不亚于流行文化界对艾柯的尊崇，然而如此的地位在中国的符号学界目前还尚无充分回应。中国文坛一贯的人本立场使生态主义一直难以展开，表面看来，我们的符号学思路更显得如此。

契机总是有的，这根源于符号学本身所倡导的多元主义和学科交叉。在当代东方的符号学研究中，超越人文的理论也曾引起不小的轰动和共鸣，比如“莫斯科—塔尔图学派”一度创立的符号学理论就为中国的符号学界不断研究，至今方兴未艾。且不论上文所提到的西比奥克的学术地位与理论意义，仅从这点来看，西比奥克的符号学思想对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就应该有着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因为引进相互关联但又有着本质不同的理论(比如西比奥克与洛特曼的两种符号学建模系统)来进行横向的对话比较，其本身就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而由西比奥克开启并锐意促进的当代符号学新思路所倡导的也正是这种多元的、跨学科的对话。

参考文献:

- 康澄. 2006. 文化符号学的空间阐释——尤里·洛特曼的符号圈理论研究[J]. 外国文学评论 (2): 100 - 108.
- 薛忆沩. 1996. 走进当代符号学的必经之路[J]. 书屋 (1): 12 - 14.
- 赵毅衡. 2012. 中国符号学六十年[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 5 - 13.
- Anderson M. 2011. Tackling Tom, Lumper and Splitter Par Excellence [C]//Cobley P, Deely J, Kull K, Petrilli S (eds.). Semiotics Continues to Astonish: Thomas A. Sebeok and the Doctrine of Sign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1 - 29.
- Barbieri M. 2008. What is Biosemiotics? [J]. Biosemiotics (1): 1 - 3.
- Chao Y. 2006. Linguistic Essays by Yuen Ren Chao [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obley P. 2011. Sebeok's panopticon [C]//Cobley P, Deely J, Kull K, Petrilli S (eds.). Semiotics Continues to Astonish: Thomas A. Sebeok and the Doctrine of Sign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85 - 114.
- Cobley P, Deely J, Kull K, Petrilli S. 2011. Introduction: Thomas A. Sebeok: Biography and 20th century role [C]//Cobley P, Deely J, Kull K, Petrilli S (eds.). Semiotics Continues to Astonish: Thomas A. Sebeok and the Doctrine of Sign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 - 18.
- Deely J. 2011. Thomas A. Sebeok and semiotics of the 21st century [C]//Cobley P, Deely J, Kull K, Petrilli S (eds.). Semiotics Continues to Astonish: Thomas A. Sebeok and the Doctrine of Sign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23 - 160.

- Eco U. 2011. Eco letter of 11 January 2002 [C]//Cobley P , Deely J , Kull K , Petrilli S (eds.) . Semiotics Continues to Astonish: Thomas A. Sebeok and the Doctrine of Sign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465 –466.
- Kull K. 2011. The Architect of Biosemiotics: Thomas A. Sebeok and Biology [C]//Cobley P , Deely J , Kull K , Petrilli S (eds.) . Semiotics Continues to Astonish: Thomas A. Sebeok and the Doctrine of Sign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23 –250.
- Peirce C. 1935.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M]. Hartshorne C , Weiss P (eds.)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trilli S , Augusto Ponzio A. 2001. Thomas Sebeok and the Signs of Life [M]. Cambridge: Icon Books.
- Sebeok T. 1995. Into the rose-garden [C]//Deely J (ed.) . Thomas A. Sebeok: Bibliography 1942 –1995. Bloomington ,IN: Eurolingua: 115 –125.
- Sebeok T. 2001. Signs: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Sebeok T. 2011. Summing up: In Lieu of an Introduction [C]//Cobley P , Deely J , Kull K , Petrilli S (eds.) . Semiotics Continues to Astonish: Thomas A. Sebeok and the Doctrine of Sign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451 –459.
- Simpkins S , Deely J (eds.) . 2001. Semiotics 2000 “Sebeok’s Century” [M]. Toronto: Legas.
- Simpkins S , Deely J (eds.) . 2002. Semiotics 2001 [M]. Toronto: Legas.
- Umiker-Sebeok J. 2003. Thomas A. Sebeok. A Bibliography of His Writings [J]. Semiotica , 147 (1 –4): 11 –73.

An Integrator of the Humanities and Science: The 20th Century Master Semiotician Thomas A. Sebeok

YU Hongbing

Abstract: Thomas A. Sebeok has been widely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eading convenors and theorist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semiotics from the 1960s onward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ebeok’s contributions are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The first is his leadership role in organizing and spearheading nearly half a century of world-wide semiotic campaign , which brought together specialists in varied fields in joint commitment to the global prominence of contemporary semiotics and thus educated and influenced a whole generation of semiotically minded scholars worldwide. The second is his seminal theoretical innovation while steadfastly promoting and advancing the Peircean-Morrisian tradition of semiotic inquiry. What is particularly remarkable about Sebeok is that he integrated various sources of his theoretical inheritance in both the humanities and science , including linguistics , folklore , anthropology , semiotics , and biology. By doing so , he proposed for zoosemiotics and biosemiotics , among others ,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paradigm that traverses and merges the humanities and science , and eventually establishes the three-tiered Modeling Systems Theory. It is clear that Sebeok truly fulfilled ,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 the function and vision of semiotics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y , creating a vast brave new world of research for subsequent generations of semioticians.

Key words: Sebeok; language; semiotics; Modeling Systems Theory; semiosphere

责任编辑: 王俊超